

LI SHI HUI GU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记录历史瞬间·回忆革命历程

历史
回眸



永远的丰碑

主编：殷立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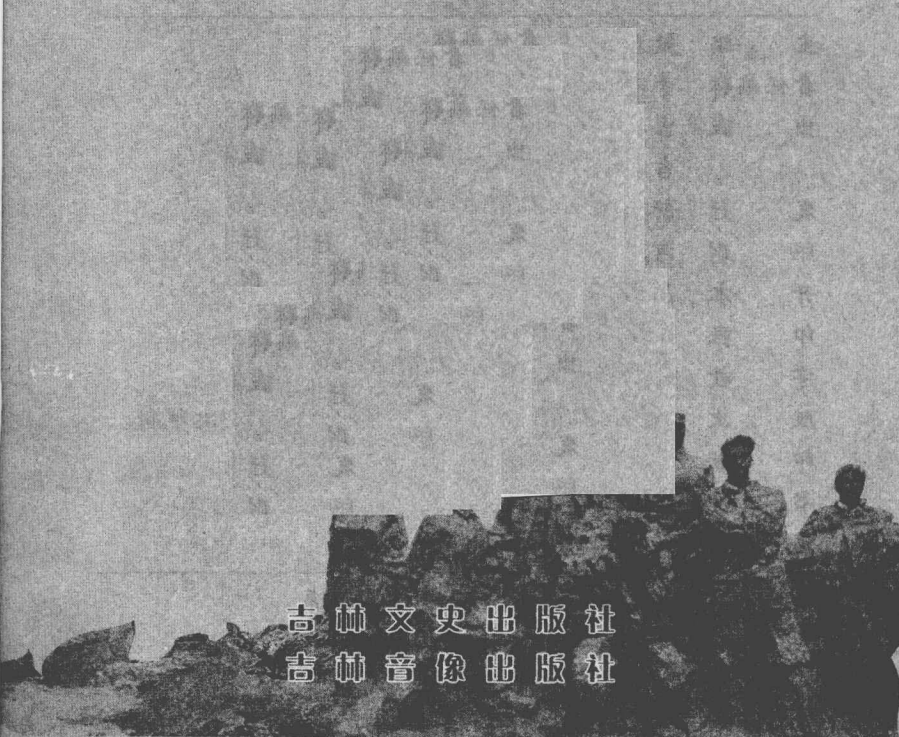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K250. 6
107
:4

永远的丰碑

主编：殷立群

(四)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丰碑/殷立群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702-358-9

I. 永... II. 殷... III. 中国—现代史—史科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399 号

永远的丰碑

主 编 殷立群

责任编辑 于 泓

出 版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23

字 数 213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358-9/K·21

定 价 439.00 元(全十八册)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王明是怎样上台的

遵 义 会 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历了一段马鞍形的过程，它首先是土地革命的兴趣和勇气减退，“围剿”的三次失败，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失败。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使中国革命开始走向绝境。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为了深刻地了解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需要从说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形成说起。

王明（又名陈绍禹，化名陈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他原名王生予，湖北人。1921年，进入武汉圣约翰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担任武汉青年社社长兼宣传干事。1923年10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俄罗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秋，大学毕业不久，因俄文说得不好，经论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火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会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天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王明是怎样上台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历了一段马鞍型的过程，这就是从土地革命的兴起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其中，起了力挽狂澜作用的，便是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于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为了深刻地了解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需要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形成说起。

王明（又名陈绍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他1904年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4年，进入武汉商业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他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925年10月，湖北中共党组织送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到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因俄文说得好，理论





背得熟，很快就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随后，米夫把他送进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准备把他培养成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米夫安排王明为重要翻译，接参加大会工作。在选举“六大”中委的筹备会上米夫说，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理论水平很低，暗示大会选举王明等人进入中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之后，米夫亲自安排王明担任中山大学党的支部局书记。米夫的支持下，他拉帮结伙，组织宗派小集团，打击和陷害很多党的好干部。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团员有邓中夏、王若飞、蔡和森、陆定一同志。中共代表团并不同意王明宗派小集团在中国革命的一些策略问题上的意见，曾经同王明等人发生过争论。尽管王明等的观点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却得到了米夫的支持。于是瞿秋白同志就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的主要打击对象。

1929年2月，王明回到上海，后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干事、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发表过许多带有“左”倾思想的文章。

王明在国内开始工作的时候，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在新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



陷入了盲目性。他们错误地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所谓“第三时期”，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因而提出各国党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工人阶级去解决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任务”，且对中国革命的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转变的速度，都作了过“左”的估计。

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思想很快膨胀起来。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犯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王明抓住这个机会，起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1930年7月，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左”倾冒险主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时，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不是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李立三对王明等人的结伙起哄十分恼火，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和“小组织者”等帽子，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职务，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王明日后自我宣扬，以此夺取领导权的一个政治资本。

1930年8月，瞿秋白等同志回国。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李立三也承认了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理应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肯定。然而，并非如此。共产国际接连写来两封信，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立三路线”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党中央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严厉指责瞿秋白，说他犯了“调和错误”，“耍两面派”，“搞小团体活动”，完全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共产国际的来信，再一次造成中共党内的严重混乱，“左”的空气又一次抬头。王明等人原来是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并且接受了党组织分配他们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的任务。但王明得知共产国际来信的内容后，反常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批评，指责中央犯了“对立三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混合物”等。同时，又和博古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取消他们在“立三路线”时期所受的处分，企图逼迫中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还以此为借口，公开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赖在上海，精心炮制他们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纲领——



被他们称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意见一出口，他们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打扮成反“立三路线”的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硬说“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由此可见，他们举着拥护“国际路线”的金字招牌，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

11月底，共产国际的来信在党内宣布了。王明等人认为时机已到，便公开打出所谓“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这时，原来因反对“立三路线”而遭到打击的一些人也纷纷响应共产国际的来信，起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也卷了进去。结果掀起了一阵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风潮。

以上是王明上台的基本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又一次派米夫来华，一手包办了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一到中国就向王明交了底。王明用半个月时间，完全按照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左”倾“进攻路线”，加紧修改他们的那本《两条路线》的小册





子。与此同时，米夫将周恩来等人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弃之不用，自己起草了另一份决议，并且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参加人员到会。果到会的 37 人中，王明等 15 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人数的 40.5%。这些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米夫在会议报告中强调，李立三一贯反对列宁主义，要赶下台；瞿秋白旧错加新错不能再当领导了；何孟雄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不能上台。谁能当领导呢？四中全会就是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王明根据《两条路线》小册子，摆出一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架势，大放厥词。他完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实际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策略的政治纲领，为新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在米夫的高压下，实现了共产国际把中共改造成一个完全“忠诚”它的支部的愿望。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会后不久，王明又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就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了掌握了党中

央的实权。

1931年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不久被蒋介石处死）。王明在上海郊区疗养院住了一阵以后，经米夫同意于1931年10月去了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参加了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工作。

二、根据地来了帮 “洋房子先生”

王明上台的前后，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1930年4月，我党已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10多个省建立了大小10多块根据地，红军发展为14个军，约10万人。为了加强对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作为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同在中央根据地正式成立。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未到任，由项英代理。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由毛泽东代理书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使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工作方针。原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只知道用俄国革命的模式来套中国，也就是坚持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城市中心论。他们不知道那种首先争取群众，然后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然而，出乎他们的预料，中国的许多块农村根据地和诸多支红军却独立自主地建立和发展起来了。共产国际看到了这个事实，只好伸出手来抓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了。

六届四中全会虽然通过了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纲领，可是，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要想在中共党内实行这条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非易事。当时各个苏区在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和一整套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得治国安民艺术的领导骨干。这批领导骨干是不会赞成脱离实





际的“进攻路线”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只有直接派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抓权，实现其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才有真正推行“进攻路线”的可能性。因此，“左”倾中央首先就在组织上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路线的斗争。这时，中央苏区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第二次“围剿”，使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9月20日通过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片面强调形势对革命发展有利的一面，认为“革命危机逐渐成熟”、“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富农路线，黄色倾向，反帝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以至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等”。由此，在苏区、白区更加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中央苏区，“左”倾中央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1931年9月1日。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一些过“左”的指示精神（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倾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总前委写信，错误地批评毛泽东“阶级路线不明确和群众路线，不充分”，在土地改革中实





行右倾政策，对地主、富农打击不力。根据这个指示，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把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诬蔑为“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还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红军，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等。结果，排斥了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职务，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毛泽东的党内职务被撤销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召开了宁都会议以后，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内职务，让他专做政府工作。为什么在宁都会议上又一次打击了毛泽东呢？原因是这样的。

为贯彻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目前党内的任务是“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从而正式提出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特征的“积极的进攻路线”。对于这一冒险主义的计划，毛泽东根本不赞成，他认为“围剿”和反“围剿”将是中国红、白两军作战的规律，红军要想打破敌人的“围剿”，就必须建立强



大的根据地和红军。因此，他不仅反对出兵攻打大城市，而且建议打通中央苏区和赣南、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和巩固，为长期的反“围剿”战争造成一个巩固的后方。这一战略设想与“左”倾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有原则的不同，争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月10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准备在“首取赣州”之后，顺赣江而下，夺取吉安、樟树、南昌等大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首先胜利。赣州战役前，毛泽东曾经提出反对打赣州的意见。他认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因为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大多数人坚决要打，赣州战役还是打响了。

赣州战役历时33天。红军虽经数次爆破，两次总攻，但由于赣州易守难攻和敌军增援，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赣州没打下来。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举行会议，讨论红军今后去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攻打赣州的错误，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应向赣东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方发展。但是苏区中央局又一次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后来，在行军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开会又决定，由毛泽





东率领东路军向闽西发展。

从4月至7月，东路军在毛泽东率领下发展顺利，先后取得了漳州战役和水口战役的胜利。7月下旬，中央局代表周恩来到了前方，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建议设立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毛泽东担任。经过周恩来的坚持，取得了中央局的同意。8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8月间，在周、毛、朱、王共同领导下，红军又成功地进行了乐安、宜黄战役和南丰战役，连克三城，给敌人以很大震动。蒋介石急忙调遣10个师的兵力增援江西，并准备调集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不顾这一客观事实，指示红一方面军硬攻南城。周、毛、朱、王不同意这一指示，并在9月26日由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训令》，要求红军部队抓紧时间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布置战场，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做好准备。这一《训令》对敌军的行动策略作了准确的分析，对我军的战备工作作了周详的部署，对以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料，这份《训令》又一次触怒了以项英、顾作霖、凯丰为代表的一伙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他们秉承临时中央的旨意，于